河东记忆

范仲淹的蒲州岁月

□冯红寅

近日，读《范仲淹传》，方才得知北宋一代名臣范仲淹曾在蒲州有过一段短暂却至关重要的执政经历。

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范仲淹因直言进谏，上疏请求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还政于宋仁宗，触怒权贵，由京城秘阁校理被贬为河中府通判。而河中府治所便在古蒲州（今山西永济），自此成为他“先忧后乐”思想萌芽与初步实践的重要舞台。虽任职仅一年有余，他却以仁厚为政的实绩、刚直不阿的风骨，在蒲州千年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贬谪蒲州
直言风骨的淬炼

蒲州，古称蒲坂，《史记》称其为“天下之中”，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发祥地之一。北宋天圣年间，河中府（治蒲州）下辖河东、虞乡、永乐、猗氏、临晋、万泉、闻喜、安邑八县，辖境涵盖今山西永济、临猗、万荣、芮城、夏县等晋南区域，是北宋河东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军事要地。

范仲淹被贬至此，绝非仕途沉沦的终点，而是其政治理想从书斋走向民间、从理念落地为实践的关键转折。北宋通判一职，由朝廷直接委派，既是州府副长官，又执掌民政、狱讼、赋役监察等要务，拥有直接向朝廷奏事的权力，素有“监州”之称。身处贬谪境遇，范仲淹未曾有丝毫消沉，他始终秉持“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的信念，放下仕途失意的郁结，将全部心力投入蒲州的民生治理，直面当地百姓疾苦与政务积弊。

蒲州任上，他始终坚守直言敢谏、心系苍生的为官本色。天圣八年（1030年）三月，朝廷为修建太乙宫、洪福宫，执意从陕西征调四万九千余根巨木，工程浩大，劳民伤财，加重百姓负担。范仲淹虽身处地方、官职不高，仍毅然上《谏买木修昭应寿宁宫奏》（注：文中太乙宫、洪福宫为昭应、寿宁宫相关营建工程，史籍记载统一为昭应、寿宁宫），直言痛陈“大兴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力谏朝廷停止苛役，体恤民力。同年七月，他再上《减郡邑以平差役》疏，针对地方机构冗杂、百姓差役繁重不均的弊端，建议精简郡县、均衡徭役，字字句句尽显“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担当。

仁治蒲州
惠慈及民的政声

《蒲州府志》以“为政仁厚，惠慈及民，甚溥”10字评价范仲淹在蒲州的治绩，这一赞誉，在地方史志对历任官吏的记载中，实属难得的至高评价。

履职期间，范仲淹推行宽政，革除积弊，一心为民纾困。当时蒲州紧邻黄河，境内涑水河道常年淤塞，每逢汛期，黄河水患频发，不仅淹没农田，更阻断交通。范仲淹亲临一线勘察水情，组织当地百姓修筑黄河河堤、疏浚涑水河道，加固城西黄河浮桥，既筑牢了防洪屏障，保障了农田灌溉，又畅通了两岸交通往来，解决了百姓长久以来的心头之患。针对当地赋役不公、苛役繁重的顽疾，他逐一核查户籍田亩，推行减负安民举措，让饱受盘剥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永济县志》亦明确记载其“为政忠厚，大著惠爱”，当地百姓感念其恩德，足见他的仁政之举早已深入人心。

同时，范仲淹极为重视文教教化，在蒲州公务之余，讲学论道，传播儒家仁政爱民思想，倡导勤学向善之风，推动当地文风日渐兴盛。他在蒲州期间，写下《送何涉秀才》《依韵酬毋湜推官》等诗作，诗文笔触间，既有对蒲州雄奇山水、上古遗风的由衷眷恋，更饱含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切、对百姓安乐的殷切期盼。这段蒲州为官的民生实践，也成为他日后推行“庆历新政”、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的重要思想源头。

文脉相承
蒲州印记的千年回响

蒲州素有“三圣故里”的美誉，这里的“三圣”，指的是上古尧、舜、禹三位圣王。据《通典》《水经注》《帝王世纪》等诸多典籍详实记载，尧旧都于蒲，舜定都蒲坂理政，大禹亦在毗邻的安邑建都治水、治理天下，三位上古圣王先后在此施行德政、教化万民，留下了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的上古治世传统，也让蒲州成为河东地区政脉与文脉的根源之地。

范仲淹在蒲州的短暂任职，是其人生与思想成长的关键历练。这片沉淀着尧、舜、禹德政遗风的厚重土地，既进一步滋养了他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又为其诗文创作注入了苍劲雄浑、心系苍生的精神底色。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被召回京城，任参知政事，主持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其改革核心主张“固邦本、厚民力、革弊政、安百姓”，正是源于蒲州任上对民生疾苦的真切体察、对地方治理的深入实践。庆历中期，范仲淹以河东、陕西宣抚使身份再次巡察河东地区，依旧不忘初心，心系蒲州及周边百姓，主持修复麟州城，安抚招还流亡百姓三千余户，减免苛捐杂税，废除酒类专卖让利于民，始终坚守并延续着在蒲州时立下的仁政初心。

千年流转，如今的蒲州大地，依旧留存着范仲淹的文化印记与精神传承。永济市档案馆珍藏的乾隆《蒲州府志》《永济县志》，完整详实记载着他在蒲州的治绩与政声，成为跨越千年的历史见证；当地民间代代相传的“范文正公通判蒲州”的故事，口耳相传中延续着对这位清官廉吏的敬仰与纪念。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早已超越地域界限，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成为代代传承的精神标识。

从苏州吴县到河中蒲州，从京城书斋到河东基层任所，范仲淹在蒲州的一年多时光，是其仕途与思想蜕变的关键节点。这里的滔滔黄河涛声，淬炼了他刚直不屈的风骨；这里的德政遗风，坚定了他仁政爱民的信念；这里的民生疾苦、治理实践，筑牢了他“利泽生民”的毕生初心。蒲州以一方水土滋养了这位北宋名臣，而范仲淹亦以仁政实绩与精神文脉，为这片古河东大地留下了永恒不朽的精神财富。

文史拾零

猛将庞德的河东之战

□王振川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记得一位猛将庞德。

庞德是马超的部下，跟随马超投奔汉中张鲁。马超离开的时候，庞德患病不能跟随，留在了张鲁的手下。曹操平定汉中，庞德就跟着张鲁投降了曹操。

后来，关羽围攻樊城，曹操派于禁和庞德等人率军增援。关羽水淹七军，大将于禁兵败投降，令人大跌眼镜。庞德宁死不降，被关羽斩首。

庞德的武艺很好，作战十分勇猛，是个好将。当时，他的故主马超、从兄庞柔都在蜀汉一方，他归降原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他却因为先前有人猜疑，自己曾经发誓赌咒，所以坚持到底，自蹈死路，令人十分惋惜。但对曹操一方来说，庞德确实是尽了忠，并和“软骨头”于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明朝有一幅名画《关羽擒将图》，被绑在角落的壮汉，就是庞德。

庞德早年间曾经跟随马超在河东作战，并立了大功，这故事《三国演义》没有写到，一般人都不知道。

曹操征讨袁谭兄弟的时候，袁谭派郭援、高幹等人率军进攻河东郡。曹操则派钟繇率领关中诸将进入河东，迎击袁军。庞德和马超在一起，属于关中诸将的一支，也进入了河东。

决战发生在当时河东郡北部的平阳，也就是现在的临汾市区周边。马超这支骑兵队伍负责主攻，而庞德是马超军的先锋。他们的战斗力很强，一战就击溃了袁军。庞德本人，还亲自斩杀了袁军的主将郭援。他为人谦虚低调，立功之后不肯声张，把郭援的首级斩下来，悄悄收进了袋子。

战争永远是残酷的悲剧。曹军主将钟繇和袁军主将郭援原本是甥舅关系，郭援是钟繇的亲外甥。打仗的时候不能讲亲戚情面，收尸的时候就得讲感情了。军中传说敌军大将郭援死了，但钟繇就是找不到外甥的首级。

最后，庞德从自己马鞍的袋子里掏出一个首级，很不好意思地向钟繇道歉谢罪。钟繇抱着外甥的首级放声大哭，却也不肯怪罪庞德。他说：“郭援虽然是我外甥，但他是国贼，死了应该，你不必向我道歉。”

战后，庞德因功被封为中郎将、都亭侯。

庞德在河东立功，对我们河东人来说当然不算什么重要的事。这场战争的正面意义在于清除了一批支持袁军的河东豪族，帮助当时的河东太守杜畿扫清了执政障碍。战争结束后，杜畿就开始从容治理，把河东郡打造成汉末三国时期的富郡、强郡及文化之郡。

庞德，算是间接地为河东人办了好事。

“铛脚刺史”薛大鼎

□欣闻

在唐初贞观、永徽年间的河北大地，一句民谣广为流传：“河北盛传三刺史，首推沧州薛大鼎。”薛大鼎与瀛州刺史、冀州刺史三人，皆勤政爱民、政绩卓著，因三州相邻、鼎足而立，三人被百姓亲切地誉为“铛脚刺史”。

薛大鼎（？~654年），字重臣，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隋唐时期大臣，介州长史薛粹之子。他出身河东薛氏，本为名门之后，却因父亲卷入隋代皇室争斗而获罪，年少便沦为官奴，流落偏远的辰州。从罪臣之子到底层官奴，再从士卒凭借战功重获身份，他饱尝人世艰辛，也更懂民间疾苦。这段特殊经历，磨砺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

贞观年间，薛大鼎出任沧州刺史。当时的沧州，久经战乱破坏，加之地势低洼，河道淤塞，水患频发，田野荒芜，民生凋敝。面对这样的局面，他立足州情，抓住治水兴利这一关键。无棣河在隋末以来久已废弃堵塞，薛大鼎经实地勘察，力主疏浚修复，引海水贯通内陆。从筹划上奏到现场施工，他与民同劳，不畏艰辛。

新河贯通之日，舟楫畅行，鱼盐顺流而至。百姓满怀感激，以歌谣传唱其德政：“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他并未就此止步，又相继疏通长芦、漳、衡诸河，排泄积涝，消除水患，灌溉农田，使沧州摆脱水害困扰，逐步成为商贾云集、鱼盐丰饶的富庶之地。

纵观薛大鼎一生，堪称古代良吏的典范。他虽出身名门却历经磨难，不因身世浮沉而改其志，不因境遇坎坷而易其心。为官一方，把治水、兴农、通商、除害作为施政之要，所做之事关乎民生，利于长远。他清廉自守，勤政尽责，以德政润泽一方。薛大鼎与同时期另外两位贤刺史并称“铛脚刺史”，薛大鼎之名被载入《旧唐书·良吏传》，成为后世为官者的镜鉴。

本版责编 韩立 美编 荆星子 校对 刘亚
E-mail:ycwbwh@126.com